

#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 ——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闻黎明

---

**内容提要**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关键词** 中间党派 皖南事变 调解国共矛盾

---

中间党派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每到国内矛盾尖锐对立的时候,这支力量的影响和作用就特别显著。皖南事变时期,国共间发生剧烈冲突,作为第三势力代言人的中间党派的倾向,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砝码作用。当时,中共和国民党为了获得舆论支持,均对中间党派展开争取工作。而中间党派站在维护团结抗战全局利益的立场上,亦

力图在国共间寻找一条彼此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这些努力,虽然由于国共双方坚持维护各自现实利益而最终有劳无功,但他们在皖南事变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则无可否认地对中共和国民党在不同阶段的公众形象,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力。

—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迅速建立了起来。但是,随着军事危机的缓和,一度掩盖的国共矛盾又重新显露。1938年下半年,国共军事纠纷首先在河北地区发生。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即便导致了3月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4月博山惨案、5月陕西旬邑事件、6月深县惨案与平江惨案、11月河南确山竹沟惨案等一系列摩擦事件。

在上述摩擦中,中共的军事力量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壮大。1940年秋,据国民党一份密报,称中共军队已达46万人,持有35万枪枝,并有扩充军队为百万的计划,这当然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从内心深处始终视中共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担心中共利用抗战坐大,决心利用英美苏和德意日两大集团拉拢国民政府的有利国际形势,乘机打击中共的军事武装。国民党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陕北行政区、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境不得超出冀察两省及鲁北晋西、所有纵队支队游击队一律收束编制等限制中共发展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出来的。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根据这个提示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

---

《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1940年8月6日,台北中研院1990年5月印行。

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退黄河以北。这一事态，使本来就已紧张的国共关系产生愈加恶化的趋势。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布在南方1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众所周知，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对日本进攻华中的估计过于严重，结果大撤退导致敌后出现许多空虚，这就为集中在这一带进行整编的新四军，提供了开辟和坚持斗争的机会，到1940年初，新四军在皖南、江南、江北三个地区均有不少发展。新四军活动的地带，属于军事上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的华中地区，国民党历来不肯允许异己存在，于是当他们看到敌后并不是不能经营时，就企图将新四军驱赶到日军重点加强巩固的黄河以北区域，以恢复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这是个一石击两鸟的阴谋，既可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又可假日军之手削弱中共的军事实力。

但是，中共也将华中看作“最重要的生命线”，认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存在”。另外，中共还时刻警惕着可能发生的“全国性突变”，因此认为“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出于这种判断，中共接到袁的美敦书式皓电后，深感这个问题“如处理不当，则影响前途甚大”，故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在重庆的周恩来是中共领导人最早接到皓电的，他根据各方面汇集的情报，敏锐地觉察到一股暗藏着的杀气。他一面告知

---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电报》（1940年4月4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7页。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延安切勿置之不理，一面走访了国民党上层人士。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建议周恩来：应该立刻答复皓电，并且口气要委婉，说明中共扩大军事力量是为了抗战，只是训练不力致起摩擦，现在将加紧训练，故要求国民党同意扩军、增饷、发弹。冯认为此电必对各方产生影响，他则可借机向蒋介石疏通，防止“剿共”战争爆发。显然，冯玉祥主张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但无论如何不与蒋介石分裂。为此，冯提议先发一个电报，满期后再发一个电报要求延期，以此延宕时间。周恩来还与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进行了接触，了解到他们的态度虽然关心团结，但为了和缓局势亦希望中共有所让步。

11月3日，中共决定“采取缓和态度”，即“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据此精神发出答复皓电的“佳电”，申明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不能北移的理由，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移至江北。这就是说，中共将新四军划为江南和江北两个部队，同意江南部队北移以示让步，对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为了顺利北移，中共还提出与此相配合的12项要求。中共的这个决定，主要是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关系和国际上两大阵营争夺蒋介石集团等因素，同时也考虑“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电中说，“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17页），据此可知周恩来曾告诫中共中央勿对皓电“置之不理”。

《周恩来关于反共高潮中各方意见的汇报》（1941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至37页。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18页。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83页。

事实上,国共矛盾的再次凸现,已使国内各阶层又一次深感党派问题依然是中国内政的主要症结。确山惨案发生后不久,张君勱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提出“军队国家化”主张,其后梁漱溟设计出一个“二重组织”的“党派联合体”,接着统一建国同志会亦提出成立宪政政府、党派平等、统一军队基础上达到统一的方案。这些主张与方案虽然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均反映了中间人士对于国共矛盾仍是国内政治最大障碍的共识。因此,当中间党派得知国民党的皓电时,便意识到国共间的摩擦有可能再次爆发。中共发出佳电后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着手酝酿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们在商谈改组问题的同时,亦就调解国共矛盾一事进行了意见交换。仅据黄炎培日记,便知11月13日至12月27日期间,他就分别与梁漱溟、沈钧儒、李璜、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勱、冷御秋、江问渔等有过多会晤。

在中国革命中,虽然最终结局取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政治与军事较量,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中间阶层的选 择,则对国共双方孰胜孰负起着重要作用,所谓民心向背实际上就是这一中间阶层的倾向。中间阶层的代言人是中间党派,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党派的许多领袖都集中在国民参政会中,故尔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夕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小党派”才能“影响大多数”,于是将工作重心之一,放在争取国民参政会中的中间党派参政员方面。

10月31日下午5时,周恩来、秦邦宪应邀到重庆村8号章伯钧家,与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邹韬奋、张申府等讨论国内形势。11月5日下午3时,周恩来又到康宁路5号张申府家,与邹韬奋、

---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11月13日、18日、20日、12月1日、2日、24日、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藏室存。

章伯钧、黄炎培等共商时局。11月15日晚,中间党派定期举行的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为目的“一心聚餐会”上,沈钧儒、邹韬奋、周士观、张申府、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等传阅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共佳电。11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张申府、张君勱、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再次会谈中,介绍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情况,并陈述了局部划界主张,告诉说江南新四军正在移动中。11月18日,黄炎培还收到周恩来送来的一份文件。

以上会谈虽然缺乏进一步的详细资料,但其内容则至少包含三项:一,解释不久前新四军在苏北与反击韩德勤部的原因;二,反驳国民党的皓电与齐电;三,表达中共愿意以让步求团结的决心。其中前两项十分重要,因为不仅当时,即使后来也有许多人认为皖南事变是苏北事件的延伸,而皓电所打的幌子,也正是解决苏北问题。如前所述,新四军在敌后有了发展之后,蒋介石就欲夺取果实,“中央提示案”提出后不久,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便奉蒋介石之令,于1940年9月中旬调动主力向苏北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面对韩德勤部的进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于10月上旬展开自卫反击,一举歼灭韩部11000余人。韩德勤在这次进攻中损兵折将,于是“向各方发通电诉苦”,叫嚷新四军制造摩擦,而国民党的皓电,也正是其在苏北失利后转而对皖南新四军的一种报复,以致“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中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周恩来将佳电交给中间党派时,便附上了10月21日

---

《周恩来关于反共高潮中各方意见的汇报》(1941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7页。

朱德、彭德怀为陈明苏北冲突事实致蒋介石的“马电”，这说明周恩来对中间党派的工作是从解释苏北事件入手的。

鉴于苏北事件间接牵涉到中间势力的一些重要人物，中共中央在黄桥战役后曾多次指示有关方面做好这些人的统战工作。皓电前夕的194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陈毅、黄克诚、项英、胡服（刘少奇）、彭雪枫的电报中，指示他们派人向苏北著名绅耆韩国钧、朱干臣、朱德轩、韩圣谋、董汗槎等人致意与联络。电报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而“这班绅耆与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及名绅张一以及江浙各地上海等绅商教育各界均有密切联系，在地方人士中有极大威信”，如果“能够以正确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要“把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而黄炎培也正是听了周恩来的介绍、看了朱德、彭德怀的马电后，才了解到苏北事件的内情。不过，这些似乎尚未打消他们的疑虑，从黄炎培所说的“谈国际事易，说国内事难”口气来看，说明他们还保留着一些不同看法。至于中间党派的其他人士，态度也各有不同，章伯钧曾问：中共在皖南是准备打后再讲，还是留有余地？语气中带有希望中共让步的意味。左舜生则抱怨中共过去不找他们，到了这个时候才来交换意见。沈钧儒的态度则十分明朗，他主张中共

---

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其文说佳电和马电是同时在1940年11月15日重庆中间党派组织的“一心聚餐会”上传阅的。《中央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1940年10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500至501页

应立即发动反对内战、实行反攻运动。中间党派的这些态度,表明要打破国民党的污蔑、解开人们心中的疑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中共有策略的忍让态度,不可能改变国民党的既定方针。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答复中共佳电的齐电,除指责佳电“大都以对外宣传之词令,作延缓奉行之口实”外,复严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次日,蒋介石亦下达手令,限12月31日前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面对这一电一令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在12月23日及25日接连与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邹韬奋、沈钧儒、张申府等人交换时局意见一事,表明中共加快了争取中间党派的步骤。

对于中间党派来说,他们虽然对国共这次摩擦的具体情节并不很清楚,但调解国共矛盾则一直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宗旨之一,便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不过,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中间党派还不理解中共所坚持的独立自主抗战路线,也未认识到只有以斗争求团结的道理。在他们看来,抗战初期仅有5万兵力的中共,与拥有150万兵力的国民党相比,力量毕竟弱小;中共所据有的陕甘宁等地区,也不过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临时性的地方区域。因此,全国抗战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根据这种认识,他们除了站在力图避免国共破裂的立场上,就事论事地劝说中共暂且忍辱和有所让步外,

---

《周恩来关于反共高潮中各方意见的汇报》(1941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7页。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电》(1940年12月8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70页。

转引王华斌《黄炎培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也实在拿不出有效办法。后来,中共对这一时期进行回顾和总结时,一方面认为“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使“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同时又指出皓电以后中间党派是“站在中间立场劝我们让步”,虽然“主观上对我们好”,可“实际帮助了蒋”。其实,当时中共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定积极主动的策略和加强军事上的实力,并未对中间党派抱多大幻想,更未期望其能完全站在自己一边。周恩来争取中间党派的工作,重心亦放在解释方面,目的是使他们不要偏听国民党一面之辞,只要他们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就可以减轻中共的压力。

就在中共争取中间党派的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爆发了。这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遵令北移,两日后经过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7个师8万余人的伏击。皖南新四军奋战7天7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1月15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前往谈判,被无理扣留。自红军长征以来,国民党在对中共的军事斗争中总是屡战屡败,即使是这次皖南事变,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能够成功。在意外的军事胜利面前,蒋介石有些忘乎所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但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的剧烈震动。出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利益,苏、英、美表示了严重关切。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了他不愿意听到国共

---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1、259页。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3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两军冲突的态度，苏联驻华大使潘又新也向蒋介石表示进攻新四军只能削弱中国人民军事的努力，只会有利于日本侵略者。2月7日抵达重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带来了罗斯福盼国共合作的信函，他甚至还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何进展。

和大后方许多人一样，中间党派也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解散新四军通令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的1月17日这天，才获悉皖南事变的准确消息。而18日《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更使皖南事变公诸于众。此前，中间党派虽然从各种途径获知的国共间电报中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中共已同意将江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故尔以为这一委曲求全可能对时局有所缓和，绝未料到国民党竟会做出如此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以至“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派的领袖，就奔走相告，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今天，一般著作在记述社会各界对皖南事变的反应时，主要强调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中共的同情。但是，还有一面也不应忽略，那就是这些反应并非简单地针对国民党或共产党，而是主要针对破坏国内团结、破坏抗战力量的行为。如人们经常引用的宋庆龄、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 - 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周恩来年谱（1898 - 1949）》，第491、492页。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11月出版，第201页。

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蒋介石书中,所强调的就是这一事件将会使“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被广泛引用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电报,核心也是“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中间党派对待皖南事变的态度,也应当从这一层面上来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他们后来为什么会那样不遗余力地在国共双方奔走斡旋。

## 二

皖南事变发生后,人们最主要的忧虑是担心形势有可能朝着内战趋势发展。沈钧儒觉得“共产党这次吃了大亏”,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中间党派,即便国民党内的上层人士王世杰,亦认为这将有可能会“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

为了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内战局面,中间党派首先在其内部进行了积极磋商和意见协调。1月18日当晚,沈钧儒、邹韬奋特到内定为正在筹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黄炎培家,向其表示了个人的态度。次日,中间党派为皖南事变召集谈话会,尽管这次会商的详情目前无从确知,但邹韬奋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反映他们当

---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上蒋介石书》(1941年1月12日),《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803页。

《陈嘉庚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党政府电》(1941年2月5日),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沈钧儒对茅盾谈话,转引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7日。

时的心境。邹韬奋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震惊，政府认为是军令军纪问题，我以为此事与军事有关，固无疑问，但同时除军事的意义之外，显然还含有政治的意义，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面对事实，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合理的解决。”<sup>①</sup>基于同样认识，1月23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邹韬奋、沈钧儒、周士观、张申府、李公朴、张澜等在鲜特生家召开了时局会商会。根据会商结果，黄炎培24日起草了一份关于新四军事件以及参政会问题的意见书，并利用当天蒋介石招宴的机会面交给蒋。这份意见书的原文迄今未见披露，但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它包含着前引罗隆基所说的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的不幸，而且必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一主旨。

在皖南事变中受到严重打击的中共，认为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是“蒋一大失策”，决心改变此前的让步态度，“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随之，中共据此制定了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斗争策略。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时决定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提出之“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面交与中共联络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要其转交国民党中央。这十二条中最主要的内容有：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

① 邹韬奋：《抗战以来》，《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5年11月出版，第331页。

②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1月23、24日。

③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致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1941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1页。

政,实行民主政治等。

当中共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日军乘国民党掀起这次反共高潮之际,于这年1月下旬发动了河南攻势。这是抗战以来自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共分析这次战役的原因,认为正是蒋介石“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并且“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都“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打击”。中共的态度和国内外异乎寻常舆论反应,加上日军的乘虚而入,给蒋介石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使他醒悟到武力解决中共还为时过早。1月27日,蒋在重庆中央纪念周讲话中以低调口吻力图使事件缩小范围,申明这次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不牵涉其他问题”,“对于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联,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很明显,所谓“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是指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绝无什么政治性质”则是不将此事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相联系,这样“紧张了十天的空气,开始有了缓和”,皖南事变也由此转入善后阶段。

在皖南事变的善后阶段里,国民党企图用少许让步换取中共对于将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的承诺,以此减轻舆论压力和继续获得国际援助。但是,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接受让其低头认

---

《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我党对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2页。河南战役发生于1941年1月下旬,当时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三路将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等部15万人包围于平汉线以东,很快占领沁阳、舞阳、西平、上蔡等县。日军的这次进犯,迫使洛阳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向后迁移,潼关一带的国民党军亦不得不星夜兼程增援。这一态势,造成战役地区的国民党将领,也不赞成对中共军事力量做进一步行动。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1941年1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编选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第389页。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罪的中共十二条,不过他采取的方式,是拒绝接受周恩来信函和拒绝与周恩来见面,以此来回避与中共直接对话。当时,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定于3月1日召开,毛泽东首先想到用抵制出席的手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于是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就与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大会紧紧联系了起来。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设立的参政议政机关,尽管人们对参政员的遴选、参政会的职权等并不满意,但它毕竟具有战时临时民意机关的性质,因此被视作抗战期间全国团结统一的象征。站在维护统一立场上的中间党派,觉得任何矛盾都不应成为影响团结的理由,任何分歧都可以摆到参政会上,由代表民意的参政员们进行评判与调解。蒋介石看准了中间党派的这一心态,同意他们出面向中共进行说服工作。应当承认,中间党派对中共提出十二条的动机是理解的,但是他们深知国内的一切矛盾只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才能有望解决,所以他们并不赞成中共置身于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合法议政舞台之外。这样,如何设法使中共十二条善后办法能够获得提出的渠道,便成为中间党派急切解决的问题。

2月10日,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勱等,在远离重庆市区的周土观在家中举行时局座谈会,周恩来应邀参加。会谈中,他们首先对中共在新四军问题没有合理解决以前不出席二届参政会的态度,表示谅解,同时为了寻找一条国共双方都可以体面接受的条件而设计了两项措施:其一,以中共七

---

1941年2月7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见《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6页。

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此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其二,成立一个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中共的十二条在此会上提出。中间党派还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他们也将以这样的“参政会开的无意味”和“讨论反共问题,他们不能奉陪”为理由,不出席这次参政会。

分析中间党派提出的两项措施,可以看出它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当然是满足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第二重意义则是借此机会组织一个具有实际权力的机构。这两个问题既相互关联,也各有侧重。应当说,这个建议对中共提出十二条是有利的,也算得上是一个留有余地的折衷转圜办法,因此周恩来建议延安可以接受。2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意见,但为了防止各党派委员会可能被国民党控制和利用,特别强调它应当是“在参政会外”的独立机构。

中共中央的复电,固然考虑到形势发展等因素,但也表明了对中间党派意见的尊重,使他们体会到中共的通情达理。但是,毛泽东的立脚点并不仅仅是能够提出十二条,而是决心利用社会舆论对中共的空前同情,和国内外对国共分裂的担心,在政治上坚决打退国民党的攻势。因此,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的当天,毛泽东又带着自信给周恩来发去第二份电报,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因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毛泽东也估

《周恩来年谱(1898 - 1949)》,第492页。

《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的反应》(1941年2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2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中卷,第269页。

计到蒋介石是不会承认十二条或其中的一部分的,但他认为十二条可以作为政治攻势,并且它“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基于这种乐观估计,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强硬立场。2月18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向中间党派及有正义感的20余位参政员送去了抄件。这份公函中,中共坚持十二条办法,同时声明它们在“未得政府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

对于中共的意图,王世杰十分清楚。他认为“此种态度表示,似系借以要胁”,于是马上让张冲转告周恩来,声称“如此做法,只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故尔“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受命后,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不断请求周恩来暂时收回公函,那怕两天也好。张冲的理由是:中共十二条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个月,但由于考虑到国际影响,国民党一直没有正式公布,现在若向参政会提出,势必要付诸讨论,而蒋介石肯定不会同意取消1月17日命令,也不会答应取消一党专政,结果双方必然翻脸。张冲的请求遭到周恩来严词拒绝,周回答到:“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但是,张冲仍纠缠不休,又请求以他本人的名义代转延安,将公函缓期两天提出。

提出与收回十二条办法,是国共在皖南事变善后阶段的第一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0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3页。又,周恩来1941年2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及《王世杰日记》,均系送达公函的时间为2月19日。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19日。

《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3页。

个回合。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局面陷入了僵局。随着国民参政会大会日期的迫近,中间党派不免十分着急。2月22日,由沈钧儒作东,邀集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李璜、梁漱溟、章伯钧、张澜、罗隆基、邹韬奋、周士观等一起商谈国民参政会提案建议事,并就参政会下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解国共关系和讨论民主问题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会中,推举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三人将上述意见归纳成文,并由梁漱溟执笔草稿。会后,他们特征询了周恩来的态度。周当即表示:特种委员应当称作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它既不属于参政会,也不属于政府;此委员会应当是各党派的一种协议机关,它既不妨碍各党独立,也要保持党派批评自由;各党派各出一至两人,国民党不能太多,并且不能有军人。这个意见合情合理,受到中间党派的尊重。2月24日中间党派再次聚会,讨论梁漱溟草拟之容纳了周恩来意见的意见稿,稍作修改后便以年龄为序慎重签名。正式签名的意见书共有4条要点:(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之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8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3至494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很明显,这4条意见体现了中间党派的强烈参政欲望和重要改革主张,它虽然将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必不可少列为首项,但核心内容则在后三项。其中关于军队统一于国家问题,既是针对“永杜纷争”,更是基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必备条件;关于特种委员会,正式提出时未采用周恩来提出的“各党派委员会”名称,而是使用了“各方面合组委员会”这一待定名词,不过其性质依然是监督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至于该委员会决议可不经任何机关核定立即生效,则无疑将各党派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之上,其地位作用显而易见。对于熟悉宪政运动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框架几乎可以说是1940年3月《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即“期成宪草”)中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的翻版。尽管这个方案后来被国民党束之高阁,但是中间党派却一直对它情有独钟,所谓“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可以说就是期成宪草中“国民大会议政会”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人数大为减少罢了。

### 三

中间党派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构架,对其自身来说可谓渴望已久。特别是具有权力再分配意义的“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如能成立,那么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唯一成果便可以得到保留。因此,中间党派在国共两党中积极奔走的动力之一,就建立在力图使这个方案得以实现上。

---

关于《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问题的研究,请参阅拙文《“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战时期改革中央政治体制的重要尝试》,《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2月25日,中间党派约请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再次征询对上述4条正式意见的态度。几天前,周恩来已考虑到“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为此,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一,“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提出参政会,也是可以的”;二,“或者国民党承认二届参政会延期开会,则我们的问题也可稍缓提出”。<sup>①</sup>这个建议,显然容纳了与中间党派协商的成果,所以周恩来爽快地表示:第一“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并“愿意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甚至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出席参政会“不成问题”。

应当承认,中间党派的上述4条意见,对于始终坚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来说可谓颇为尖锐,他们之所以决心这样做,是得力于代表中共的周恩来的接受。正因如此,2月27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褚辅成、左舜生6人应约见到蒋介石时,才壮着胆子面呈了他们的意见。此外,他们还就两个问题做了口头说明,其要点为:第一,“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第二,“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

---

《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3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3页。

周恩来、董必武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这4条为:“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四,成立各方面有关的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上项之执行。”见《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1页。

现的权”。

客观地说,中间党派对这些要求能不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并无把握,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蒋竟然在原则上表示了赞成,只是说“参政会原为政府邀请大家共谋团结者,无条件可言。在政府,当然希望中共参加,但中共出席与否,当由其处自决”。另外,“军队与党派绝缘,最好勿向外说,否则国民党人会以为向中共投降”。话虽这么说,总之蒋介石是接受了中间党派的建议。蒋介石的这个态度使中间党派感到还有进一步说话的余地,于是不失时机地接着又说明了4点,第一点就是2月22日周恩来的“此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第二至四点为:“委员会九人,请蒋为主席”,“请各党派负责人参加,决不限于参政员”,“以此与中共代表商谈”。对此,蒋介石答复了两字“可以”,但又说“所商决者须中共能执行”。

其实,蒋介石最关心的绝对不是建立具有分权性质的什么委员会,他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换取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的确颇费了些心计,他曾通过张冲向周恩来表示,同意第十八集团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但条件是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张冲带着这个意思与周恩来见面时,碰了个钉子,于是蒋介石同意了中间党派的建议后,便一再要张澜等去做周恩来的说服工作。而张澜等根据2月25日周恩来的态度,以为这不成问题,当天中午就转告给周恩来。晚上,中间党派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

---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4页。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1页。  
《周恩来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2月25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76页之注释二。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4页。

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再度会商,并请撤回不肯出席参政会的函件。周恩来则明确答复:参加各党派委员会的代表人选须请示延安后方能确定,出席参政会问题上亦只有十二条得到国民党的确切保证后才谈得上。

不难看出,周恩来的答复与2月25日的表态有所区别,这是由于延安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使十二条能够被提出来,而是国民党必须接受直接关系到陕甘宁边区的辖境、军事编制与驻地等现实利益的条件。对于中间党派最热衷的党派委员会,中共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不相信它能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条件下会有多大实际效用。而中间党派却满心欢喜地以为中共只要获得提出十二条的渠道,就可以出席参政会,因此当得知中共的条件是必须国民党首先接受十二条时,就知道事情又要棘手了。他们希望中共能理解他们的苦衷,希望周恩来再次向延安请求。周恩来虽然答应了其请求,不过在致延安的电报中则指出: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蒋介石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

周恩来态度的改变,使中间党派感到十分为难。这是由于中间党派的努力,虽然包含着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调解,但其重心无疑放在建立各党派委员会方面。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褚辅成表示应当相信蒋介石的诚意,认为蒋能够纠正部下的错误。比较现实的黄炎培提出不妨将组织这个委员会与中共出席参政会问题分开处理。左舜生则认为如果中共不出席参政会,那么各党派委员会恐怕亦无望成立。对成立这一委员会最积极的张君勱,则主张先

---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4页。

《周恩来董必武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2月27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77页。

召开各党派委员会,在会上要蒋下令停止进攻中共军队,如能做到这一点,中共再出席参政会。老成的张澜则说:要看委员会有无希望,再谈出席问题,即出席晚到最后几天也可以。沈钧儒则坦诚地说成立这个委员会仅仅是我们的希望而已。

可见,中间党派心里清楚,他们最热衷的各党派委员会,其成立前提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否则,这个委员会不仅成立无望,而且即使成立了也不可能发挥实际作用。于是,为了扫清成立各党派委员会的障碍,中间党派不管在立足点上与中共还存在多大距离,其最紧迫的工作,都是首先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

1941年2月28日,对中间党派和蒋介石都是异常紧张的一天。上午,他们在张君勱家举行磋商。中午,黄炎培、褚辅成、张君勱、左舜生、沈钧儒一起进见蒋介石,说周恩来答应再次电告延安,可当蒋介石追问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究竟有没有问题时,他们谁也不敢负责回答。眼看参政会召开在即的蒋介石这时耐不住性子了,因为按照原定计划,参政会自第二届起改议长制为主席团制,主席团设5人,并为中共参政员留有一席。但中共参政员若拒绝出席,那便无异宣布拒绝与国民党继续合作,这势必对蒋介石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恼怒中,蒋愤愤地对这5位中间人士说:“明天中共还决定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蒋介石这番话,使中间党派感到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不出席参政会,就有可能演变为国共两党的决裂。带着沉重心情,黄、左、梁、沈顾不上吃午饭就赶到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董必武、邓颖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1至222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4页。

超转告蒋介石的话,同时请求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眼看着剩下的时间只有半天了,黄炎培不免带着情绪表示“此是分水岭关头”,希望以此力促周恩来做出“最后决定”。

黄炎培等离开曾家岩回到张君勱家,一边继续商议,一边焦急地等候周恩来电话。下午6时5分,黄炎培电话询问周恩来,回答说延安尚无回电。稍后,中间党派获悉当日下午国民党开会商量对策,决定中共若出席参政会,就选周恩来入参政会主席团,如不出席则改选女参政员吴贻芳。这个消息,使黄炎培等感到国民党已着手国共分裂后的准备了,于是立刻再赴周恩来处。周恩来劝黄、梁不要着急,甚至还告诉他们一则秘密:中共在重庆化龙桥附近有电台,每日清晨、下午、晚间与延安联络三次。周恩来说,最迟晚上延安方面必有复电,一经收到会马上通知他们。此番话给黄、梁多少带来一丝希望,当有人问他们情况时,他们都做了乐观回答。然而,黄、梁两人等候了一夜,多次电话询问,直到深夜仍无消息。

3月1日,二届一次参政会在重庆浮图关国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这天一早,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来见黄炎培、梁漱溟,说电台出了故障,收不到延安电报,在未得延安指示前不能出席。蒋介石这天也坐立不安,他打电话给黄炎培,让他做自己的代表,务必敦劝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黄、梁身感责任重大,遂与左舜生、沈钧儒衔命以蒋介石名义再次劝说周恩来。这时,延安电报已到,其指示共有4点:一,以周恩来为中共参加各党派委员会之代表;二,各党派委员会的任务是首先讨论解决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其他国家大事;三,这个委员会不能隶属于参政会;四,中共十二条

---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2月28日。

善后办法未获满意解决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为了对黄炎培等表示安慰,周恩来写了封未得延安指示前不便自主的抱歉信。

面对中共重申坚持十二条的答复,中间党派无可奈何,只能将周恩来信呈交蒋介石,同时解释说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是由于延安电令未到,非有他意。蒋介石虽然不满意这种答复,却不得不再做姿态,同意王世杰建议由黄炎培、张君勱两人出面,提议将参政会主席团主席选举推迟到次日进行。这个提议经大会决议后,黄炎培、张君勱于中午再至周恩来处“作最后之劝告”。不过,这时中间党派已经感到有些无能为力,故下午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梁漱溟、罗文干、罗隆基等相聚,商“万一决裂后如何应付”问题。

3月1日,周恩来是在兴奋中度过的。昨夜至今晨,两批特使来迎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均被拒绝。参政会开会时,蒋介石亲自提出主席团名单,会上,一百多国民党参政员鸦雀无声,任凭黄炎培、张君勱提议,未了蒋介石的讲话也是无精打采。周恩来兴奋地向延安汇报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中共代表究竟出席,人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

同时,周恩来这天也是在紧张中度过的。一天前,2月28日延安已经有了对策,考虑到中间党派的意愿,也考虑到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降低条件,改提“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有: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来电》(1941年2月28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5页。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3月1日。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页。

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与1月25日周恩来交给张冲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相比,这个临时办法不再提出取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月17日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国民党根本做不到的要求,因此梁漱溟亦认为“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

周恩来接到延安改提临时办法十二条的电报后,马上与张冲谈判,明确表示上述条件只要得到国民党明确保证,中共参政员就必能报到出席。但是,张冲深知蒋介石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防地要求,故未敢答应。事后,周恩来向延安报告了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说:“单就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这是我们(周、董、邓)共同的认识”。“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但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若出席参政会便太便宜蒋介石了。然而“今晚一夜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结果的”,并且由于蒋介石“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周恩来认为“中间的办法现在是没有了”,要么在参政会“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并约同张冲来延(安)”,要么“便是硬到底”。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后,认为不能再做让步,遂复电指出:“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

《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1941年3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7至58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5页。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至226页。

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但是,“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因为如此时出席,便等于“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

中共的不妥协态度,令中间党派不免感到悲观。皖南事变之善后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出面调解国共矛盾,却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如此艰难,失望情绪由此油然而生。黄炎培声称三日来到处奔走为的都是主和;张澜劝周恩来再忍一次;梁漱溟认为一切都没有很大希望,只愿意走一步看一步,同时希望中共也再试一回;左舜生说中共如出席参政会,国民党可得面子,中共可得全国同情,各有所获;一向比较激进的罗隆基也持同样主张;而张君勱则盼望能够成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自然急于求效。不仅他们如此,就连向来接近中共的救国会和第三党也主张中共出席参政会。沈钧儒等觉得既然蒋已稍有让步,正好借此抓住中间党派,迫使其自新,而中共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否则他们今后确实再难讲话。章伯钧则提出可与蒋介石进行条件交换。当时,国民参政会中8个中间党派一同向中共表示,他们的共同意见是:只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那么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大家愿与中共共进退。这话虽然说的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但谁都清楚,问题的核心是中共如果抵制参政会,则不仅各党派委员会不可能成立,而且国内分裂亦将必至。

中间党派急于成立各党派委员会的情绪不难理解,而蒋介石也正是以此为诱饵,对他们进行分化与利诱。中共参政员若出席

---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6页。

《周恩来关于各小党派被蒋介石拉拢后的表现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7页至228页。

参政会,其结果则只能有利于国民党,故周恩来一面提醒中间党派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一面将此情况报告延安。3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连夜召开会议,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基于国民党绝不会做出明令保证,延安指示周恩来“须决心不出席”。这个决心,来自对形势的判断。延安认为“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其原因有五: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这通过拥护政府17日命令、发布讨论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四,“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对于中间党派,则指出由于“政治斗争空前尖锐”,它们“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并且“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空气”。但是,同时又指出,“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故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

根据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指示,3月2日中共参政员继续抵制出席参政会。这天早上6时半,黄炎培、梁漱溟电话询问周恩来,周答复说马上就有回音。7时,周恩来电话告诉黄、梁,说将有正式公函送到,请在家中稍候。黄、梁以为中共方面有好消息,不禁而喜。但是,7时20分他们接到的是一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黄炎培、张澜、江问渔、冷御秋、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周士观、左舜生、李璜、章伯钧、杨庚陶、沈钧儒、褚辅成、张申

---

《毛泽东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1941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8页至229页。

府、邹韬奋等 16 位调解斡旋的中间党派领导人的函件。信中对中间党派数日来“奔赴团结”表示“钦感无既”，但强调“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解决办法早得结果”，其后中共参政员“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周恩来等人的这封专函，显然带有抚慰中间党派的意思。与此同时，董必武、邓颖超亦联名致函国民参政会，公开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并称如“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令保证”，“届时必可报到出席”。对于国民党，周恩来也有给谈判代表张冲的公函。

中共方面的一系列公函，使王世杰感到“共产党与参政会殆将从此分离”，中间党派亦有同样感受。在此情绪支配下，中间党派的态度出现了毛泽东估计到的变化。奔走最为积极的黄炎培，心情很不平静。他的爱妻刚刚去世，自己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而且连日奔波劳累，引起高烧。他是带着丧妻之痛和高烧不退参与调解的，不料一切都无所收获。对于中共的态度，黄炎培很不理解，他认为中间党派提出的 4 条建议已被蒋介石接受，这“在往之求之不得”的优厚条件还不能使中共满足，定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梁漱溟的情绪也一样低落，他后来评说这段往事时说：临时办法十二条虽然条件降低甚多，但仍属“讨价还价”。他认为“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和信念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作和事佬，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

---

《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1941 年 3 月 2 日)，《新华日报增刊》，1941 年 3 月 10 日。

《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 年 3 月 2 日)，《新华日报增刊》，1941 年 3 月 10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3 月 2 日。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 年 3 月 2 日。

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这些话,无不带有埋怨的语气。

黄炎培、梁漱溟的这种心态,不能不说在当时的中间阶层中有一定代表性。事实上,皖南事变爆发后虽然全国群情激愤,国际舆论多有谴责,但这并不证明人们就都是站在中共立场上看待这一事件。客观地说,由于国民党的严格新闻检查制度,一般人对新四军为什么不肯移驻黄河以北、江南部队为什么由泾县向苏南移动、移动的时间为什么延迟等问题,一时难于认清,故对事件真相多有揣测。此外,即使这些经过清楚了,也不排除不同看法。正因如此,当国民党在军令军纪上做文章时,一般舆论要么是认为应当遵守,要么回避不谈。就皖南事变后舆论的主要着眼点而言,国际上美英苏是出于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需要,国内则是基于团结抗战的最高利益,至于事变的具体过程,反应似乎并不象今天人们印象中那么强烈。当时比较普遍的态度,正如海外一家华侨报纸在短评中所言:“我们绝不‘袒共’,我们所痛心的为了一支抗战的有力部队丧失在对内的磨擦上”,“我们所希望的,在上的应宽大为怀,勿以小故而伤大体,在下的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同时两党的领袖,对于下级必须严加压制,俾不敢再发生抗战中的悲剧,为亲者痛,仇者快。”黄炎培的态度,也大致如此。皖南事变后,他准备见蒋介石时陈述3点希望:适可而止;军纪固重要,但须注意收集民心;把眼光向外。他还曾对人表示:不论皖南事变“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但是他还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5页。  
《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苏门答腊《民报》短评,皖南事变资料编选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2页。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1941年3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58页。

仔细分析这些话,不难看出他并未否认国民党宣传的新四军违反军纪问题,尽管他认为皖南事变绝对错误,却仍希望将是非放在一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双方都不要再追究责任了。即将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的黄炎培的这种态度,典型地反映了多数中间人士的认识。

中间党派的这些情绪,客观上给中共带来了不利影响。3月2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选举主席团,由于中共拒绝出席,原定选举周恩来,改选为女参政员吴贻芳。次日参政会大会上,王世杰报告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事后,黄炎培代表中间党派报告努力过程。可想而知,黄炎培报告时的语气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传染给在会的其他中间人士。刚刚从香港回到重庆的王云五,就是听了王世杰、黄炎培的报告后,在大会上做了即席发言。王云五说:人们既然期望国民参政会成为战时国会,那么“任何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未尝不可在本会中谋至合理的解决”,而“中共参政员主张先行解决,再出席会议”,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在参政会中开了一个恶例”。参政会闭幕前,王云五根据这个发言整理出一个包括两项内容的动议:一,对中共参政员未能出席大会“引为深憾”,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当之先例”。二,“一切问题除有关军令军纪者外,在遵守抗战建国纲之原则下,当无不可提付本会讨论”,切盼中共参政员坚守1937年9月“拥护统一之宣言,出席本会,俾一切政治问题,悉循政治途辙,获完善之解决”。这个动议虽说不能与3月9日国民党参政员张守约等提出的带有明显反共内容的《统一军令政令以

---

王云五:《参政的八年》,《谈往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9月1日出版,第68页。

利抗战之决议案》相提并论,但它能在参政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势必对中共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中间党派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努力没有成功,梁漱溟不甘心,又做了一次尝试。3月2日中午,中间党派参政员在一心饭店聚餐,听取黄炎培关于调停经过的汇报,同时研究今后的行动。对于临时办法十二条,梁漱溟表示不愿意讨论,认为“逐条磋商,必致延过了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又万无此理”。他提出可以向国共商量三件事:一,临时办法十二条已成过去,不必再议;二,临时办法十二条相当于中间党派建议成立的那个委员会,是否可按周恩来同意且在2月27日向蒋介石提出的四条主张继续磋商;三,临时办法十二条中的第一至十条暂且搁置,等委员会成立后,再交付其裁决。梁漱溟的提议,实际上是将重点转移到如何组织各党派委员会方面,他认为中间党派可以首先请周恩来与张群直接商谈,张君勱、左舜生参与,共同起草一个意见,再由蒋介石核定。梁估计,如果各党派委员会能够成立,则中共参政员仍有望在参政会大会闭幕前出席,这样亦算得上一个圆满的结局,“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和“国际友邦之望”。对于这个提议,大家态度不一,只有张澜给予鼓励,其他人则态度消极。结果,大家只同意梁以个人身份单独进行,与众人无关。黄炎培对梁说:你若要做,先得征得张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同意,再见周恩来。张君勱表示,如梁要见张群,他可为其预约时间。这样,梁漱溟便决定再做一次努力。

梁漱溟是3月4日访问张群的,两人相谈虽然甚畅,但张群不便对各党派委员会事自作主张,只是答应请示蒋介石后再说。3月5日上午,梁漱溟访张君勱时,遇到张群,张群说晚上蒋介石在

---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6页。

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届时他可以转达梁的意见。张君勱认为不必等待张群回音,不妨先听听周恩来的意见。梁漱溟倒是采纳了张君勱的建议,可是不知为什么见到周恩来时却又未谈具体问题,仅讲了些军队宜统一于国家之类的话。

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全体参政员,席后张群将梁漱溟叫到一边,问是否与周恩来见面了,若未见面,最好过了明天再说。梁漱溟有些奇怪,追问后方知蒋介石将在第二天的参政会大会上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共产党事。梁漱溟闻言急忙找到张君勱,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我愿尽今夜作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张群)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随即,梁漱溟走访周恩来,由于相谈时间甚久,当夜就住在周恩来家中。

那一夜,梁漱溟与周恩来谈了许多,其中最要紧的有两点。其一,明日蒋介石将有所宣布,为了避免加重矛盾,他已请张群等候他与周会谈后的消息,故望能与周在今夜明晨洽商出一个可以使大局善化的结果。其二,请周恩来与张群面谈各党派委员会事,中间党派参加讨论,只要委员会成立,一切事均可交付讨论解决,故仍请中共参政员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梁漱溟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将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与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联系起来,前者是条件,后者是目的。不过,周恩来并没有接受梁所说的条件,他十分坦率地答复:由于王世杰、何应钦连日在参政会大会上的两次宣布,出席参政会问题可以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只要不谈出席问题,其他任何商谈都不拒绝,尤其是关于各党派委员会

---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7页。

事。委员会如成立,中共一定参加。梁漱溟没有达到说服目的,次日只好将周恩来的话如实转告张群。

梁漱溟的努力虽然是个人行为,却是中间党派在说服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上的最后一次努力。3月6日,蒋介石从张群处得知周恩来不妥协的态度后,于当天下午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六次大会上发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演讲。蒋介石在这篇颇有煽动性的演讲中说:中共善后办法十二条与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不外乎军事、政治、党派三个问题。就军事讲,是要政府对违令叛变部队不得明令制裁;就政治讲,是要求政府在行政系统外划出特殊区域,承认特殊政治体制,以便可以养成藉外患深入之机而谋夺取政权之实的大祸乱;就党派讲,则是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蒋介石带着国家领袖的口吻声言:“在我们政府统辖之下,只有一个国家军队的系统,决不能有第二个私党私人的军队系统”;“政权只有一个,一国之内,不能有两个政权”;“在参政会之内,只有国民的立场,没有党派的立场,决不能让任何一党或任何个人,在会内有特殊的地位”。一通谴责之后,蒋介石又不得不声称:“政府对我忠实将士,实在是爱护之不遑,岂有如其所谓挑衅进攻,自残手足之理?而且以后亦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的演说明显的带有一打一哄色彩,中共亦感到了“不明

---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7至168页。

蒋中正:《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882至885页。

内情的人,多少会受一点骗”。事实也是如此,前述王云五的临时动议,就是这天得到 53 人连署提出,并在参政会大会上得到包括中间党派参政员在内的全体一致通过。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共在失去中间党派理解的时候,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陷于暂时的被动。

#### 四

3 月 10 日上午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闭幕。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已成过去,中间党派的注意力转移到组织各党派委员会方面。

这天,张澜、梁漱溟冒雨走访第二天就要返回成都的张群,他们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催促成立各党派委员会。梁漱溟说:抗战 4 年来共产党一天一天壮大,这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失败,故为国民党计,这个委员会应当尽快成立。接着他具体分析到:国民党的失败,一是遇事含糊,陕北边区是否合法便是一例;二是遇事拖延,不能迅速解决;三是单靠武力和特务警察来制止共产党的发展,而没有得到舆论的援助,作为中间党派就不愿说话了。有鉴于此,国民党如想补救,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一切问题可在这个委员会内讨论解决。由于委员会中有第三方面,讨论时亦必有公道,并且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舆论也可援助政府予以制裁。梁漱溟当然深知国民党的顾虑,所以未了特别“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

梁漱溟这番话,表明中间派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期望极高,而

---

《周恩来关于拟用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向毛泽东的建议》(1941 年 3 月 15 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234 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 6 卷,第 170 页。

且认为大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这个委员会。3月13日中午,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左舜生4人在一心饭店招待参政会同人,尤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席间,他们公推褚辅成、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5人共负催促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之事。在这件事上,蒋介石不好食言,于是交给王世杰办理。在国民党高层中,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属于比较现实比较清醒的一类。出于对国际反应的考虑,皖南事变前他不赞成围剿新四军,事变后也不赞成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二届一次参政会后,他也曾提出如果中共有诚意而不到处扩张势力的话,“政府或可划定特殊区域”,允许中共“在该区域内试验其理想并保留若干军力,同时并允其参政中央民意机关”的设想,且以此种办法“作为战后解决方案”。在王世杰看来,共产主义有国际背景,共产党问题也不是单靠武力就能解决的,根本的方法还在于“政府应力求政治清明”,才能“以愜輿望”。因此,在各党派委员会问题上王世杰持有比较开明的态度,并且还在中间党派提出的四条意见基础上,起草了特别委员会组织章程草案。王世杰起草的这个组织章程草案包括5项内容:名称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委员15人,设常委3人,人选不限于参政员;蒋介石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职责为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3月19日,中间党派将于下午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这百忙之际,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与褚辅成上午仍抽出时间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与王世杰就特别委员会章程草案

《王世杰日记》,1941年7月31日。

《王世杰日记》,1941年9月14日。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1页。

交换了意见。3月20日中午,蒋介石设宴招待新选出的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各委员,饭后与褚、黄、张、左、梁5人详谈。这天,蒋介石以礼贤下土的口气对他们表示,同意特别委员会章程草案,但成员人数似稍加灵活,常委可改为3至5人,委员改为15至19人。蒋介石接受特别委员会的态度,令中间党派十分满意,次日黄炎培在电话中对周恩来说“昨午见蒋委员长经过良好情形”。

蒋介石表明态度后,遂要中间党派携此意见与周恩来洽商。3月22日,褚辅成等如约与周恩来、董必武在张君勱家会谈。周恩来听了黄炎培介绍20日与蒋洽谈的经过后,当即表示反对将特别委员会隶属于参政会。其实,此前周恩来已就此事与延安有过电商,而延安对这个原先拟名党派委员会现又定名特别委员会的机构,始终持有怀疑,认为这不过是蒋介石的敷衍策略。毛泽东曾电问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组织这个委员会用意何在?蒋同意成立的委员会究竟是商谈接洽机关还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如果未经该党派同意,是不是也发生效力?蒋是不是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这些问题,周恩来早就反复考虑过。事实很明显,如果这样一个委员会仅仅是个摆设,中共根本就不能接受,因此周恩来主张该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且应赋以讨论各党派平等“一切政治问题之权”。毛泽东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目的是“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以“束缚我们手足”,因此问周“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加入

---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3月21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84页。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1年3月21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8页。

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的态度自然十分坚决。

面对周恩来的答复,中间党派感到有些为难。其一,特别委员会必有所属,与其隶属国民政府,倒不如隶属国民参政会好些。其二,按照中间党派的想法,特别委员会的人选还打算从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中选出。周恩来认为这很是不妥,表示本次参政会一次又一次的宣布和一次又一次的议决案,已使中共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中共无法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任何委员会。中间党派的想法与周恩来有些不同,认为二届一次参政会的职权已有所扩大,如驻会委员会增加了建议权,这就比过去进步了些。站在不同立场上看待问题的周恩来否认了这一点,他指出:照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章程规定,驻会委员会的所有建议以不背离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特别委员会隶属于参政会,那么其做出的决议又不能符合大会决议案精神时,就会有人指责该委员会的决议不合乎大会决议。这样一来,委员会的决议不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吗?在中间党派心目中,周恩来一向以谦和容忍著称,但这次他则一反常态,明确表示假使委员会属于参政会的话,那么即使延安命令自己参加,自己也要坚决推辞。

周恩来的回答合乎情理,中间党派感到无可挑剔,只能请其将特别委员会草案电呈延安征得意见后再做讨论。3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董必武应约至张澜寓所,同黄炎培、张澜续商,因有人冒失闯入,未能详谈,遂改3日后再商谈。3月27日下午2时,张

---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3月21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84页。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1至172页。

君劭、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在黄炎培家中与周恩来、董必武会见。周恩来、董必武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组织委员会的7点意见,其中需要强调的有两点。第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于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所属”。这表明中共把委员会的隶属关系问题,与它的实际地位联系起来对待。第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这一点,虽然只是增加了“联合”二字,却表明中共需要从委员会的名称上就能体现党派平等性质的要求。了解到中共的上述立场后,中间党派均有难色。他们深知这些都是蒋介石“绝不同意之处”,感到国共“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遂向周恩来声明并电话告知王世杰,声明此事不再进行。中间党派第一次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到此偃旗息鼓。40天来劳而无获的奔走,沮丧与失望可想而知。

对于中间党派在皖南事及其善后时期的表现,中共在1941年3月下旬对6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进行总结时,曾有专门分析。总结中说:“10月19日以后,他们是站在中间立场,劝我们让步,主观上对我们好,实际帮助了蒋。我们为争取他们及全国人民,采取了佳电的态度。在1月17日以后,他们完全同情我们,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但在参政会开会期间,曾对蒋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问题发生幻想,又恢复到劝我让步的立场。”中间党派不是一块铁板,以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中间党派其内部亦有左中右之分。对于黄炎培、张澜等,中共批评他们虽“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佬”。而对于国社党张君劭、青年党左舜生,则不客气地指责他们是“失意政客”,只不过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3页。

《黄炎培日记》手稿,1941年3月27日。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3页。

“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得了参政会主席团时,面孔就变了”。当然,中共认为尽管他们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中共还是承认“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间党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是“以求自保和发展”,更说明其“仍是一种中间地位”。

中共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对中间党派专门做出总结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一支不能忽视的势力。而这个问题,中共也是10个月前才有了足够认识。1940年7月底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报告,报告的主题之一即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共转变统战工作重点起到很大作用,毛泽东就是听了报告后,才在发言中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毛泽东还说: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3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其后,周恩来8月9、10两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策略和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将一切抗战力量的成败视同自己的成败,并与之休戚相关的观点。把争取中间派的工作放到如

---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个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3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69至70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00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62页。

此高度,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它对此后争取中间势力与中间党派政治进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大致勾勒了中间党派在皖南事变与善后过程中的态度,及这些态度在当时所产生的某些影响。虽然中间党派这时还不失中间性的一面,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毕竟选择了中共不愿意看到的立场。这段历史,目前大多数著作都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或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可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皖南事变对国共双方都有得有失,但若就中间党派对社会的影响而言,不能不承认皖南事变善后时期大后方的一般舆论,一定程度上受到中间党派情绪的传染。究其原因,是中间党派不可能理解国共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执行的不同抗战路线。蒋介石倚仗全民抗战的形势,利用国民党内对中共军事实力的膨胀的担忧,企图凭借社会各界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承诺,以战区与政区划分来最大程度地束缚中共势力发展。而中共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决心在抗战中不断壮大。这是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站在西方“国家观念”立场上的中间党派不可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诞生时,在《成立宣言》中将“军队国家化”置于“政治民主化”之前,甚至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仍然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相提并论的原因。这个观念,即使到了1949年他们参加新政协后,也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

夹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势力,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真是耗尽了心力。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全民抗日的形势为其生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国共间的矛盾和斗争又给其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生于斯时,成于斯时,中间势力真是遇到了一个施展抱负的绝佳时期。然而,既要俯瞰国家前途,对得起世人,对得起自己,又要在左右中国社会的两大实力集团间折冲,这样一个

沉重的历史担子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轻松。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如何妥协,它的存在毕竟是不能无视的客观现实。理解中间势力的立场,尊重他们的愿望,照顾他们的利益,保留他们的空间,则是争取获得其配合与支持,进而达到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从这点出发,简单地批评中间党派缺乏对中共十二条的理解,批评他们对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立场缺乏认识,批评他们如何被蒋介石拉拢,都无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这正如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进行总结时所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941年11月中旬,中共在再次将善后办法降低到释放叶挺和下发十八集团军军饷的条件,也未被国民党实际接受的情况下,还是让董必武出席了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这个姿态固然有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原因,但显而易见也考虑到中间党派的愿望。中间势力的政治选择对中国现代社会之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闻黎明,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3页。

这一点是就被国民党承认而言。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停止向第十八集团军发饷发械,中共在武装编制和陕甘宁行政区划上都开始放手发展,而无需再通过国民政府了。